

疫情之下的澳門

——專輯主持人語

徐建華

一、引言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近兩年了，人類仍未看到疫情結束的曙光。截止 2021 年 11 月 21 日，全球 2.57 億人感染，死亡人數高達 514 萬，疫情成為二戰以來影響人類社會的最大事件。在政治上，國與國之間因為疫情起源的追究而衝突不斷；國家應對疫情的措施往往也成為一國內部政治紛爭的根源。在經濟上，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逆全球化湧現；大量民眾失業而面臨經濟困難。在文化上，因疫情導致的污名、歧視與仇恨犯罪不僅存在於一國內部，更擴展到全球；不同民眾對口罩的接受程度的差異也激發了文化衝突。在社會層面，無數民眾經歷死亡、失去親人的悲痛；更多的人經歷了強制隔離而造成的心理創傷，民眾面對疫情而產生的恐慌普遍存在；而各國政府因應對疫情而採取封鎖、隔離而導致的次生危害也史無前例。

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其經濟、社會各方面受疫情的衝擊更是所有未有。疫情之前，由於博彩業在澳門回歸以來井噴式增長，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10 萬美元，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富有地區。作為全球最大的賭城，澳門的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於以中國內地遊客為主的旅遊及博彩業。疫情導致邊境實際上間歇性封鎖，人員流動急劇下降。2020 年入境澳門的旅客數量僅為 2019 年的 15%。2020 年澳門全年本地生產總值與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一半。作為支柱產業的博彩業收入更是下降了八成。在疫情最嚴重的 3 月份，博彩業整個月的收入只相當於正常年份的 1 天的收入。可以說，疫情對澳門社會產生的影響在全球也可謂“首屈一指”。

二、本期內容

《澳門研究》作為專門研究澳門社會的標杆性雜誌，在其具有特殊意義的第 100 期推出新冠疫情專輯，意義重大。本人受邀為本期特刊的特邀主編，倍感榮幸。在本期特刊中，七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疫情對澳門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各篇文章的視角可能不同，但都致力於釐清疫情對澳門社會所產生的後果，從而為澳門社會長期的繁榮穩定與良治作出貢獻。

第一篇文章由本人和團隊成員共同完成。在名為《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一文中，我們詳細探討了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雖然疫情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大的破壞性作用，它也產生了少數意外的好處。例如，因為人類生產與生活活動的減少而帶來了環境的改善；因為人類出行的減少而導致交通事故減少等。犯罪學的研究表明，人們的非法活動往往依附在合法的活動基礎之上。疫情導致人類合法活動受限、進而帶來的犯罪數量減少則成為其意外的積極後果之一。在本文中，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新聞媒體資料以及對警察的訪談，我們分析了疫情對澳門犯罪產生影響的具體體現。一方面，疫情使澳門犯罪率降到回歸以來的最低點，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更是下降了八成；另一方面，以電信詐騙為主體的非接觸式犯罪則顯著增加。我們進而從日常活動理論來解釋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並提出疫情引起人類活動更多地從線下轉到線上，是澳門犯罪變化背後的結構性原因。文章最後探討了疫情對澳門犯罪潛在的影響，特別指出學界和政府都應該關注疫情對澳門有組織（黑社會）犯罪的潛在影響。

本期的第二篇文章《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由唐國傑及其團隊完成。一直以來，澳門都是全球抗疫的優等生。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兩年之際（截止 2021 年 11 月 21 日），澳門疫情感染人數僅為 77 人，所有患者全部治癒出院，沒有 1 例死亡。這一成績既來自澳門特區政府快速而有效的應對，也離不開民眾的積極參與。總體來說，澳門居民對於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配合度相當高，這從澳門開展三次全民核酸檢測時民眾的積極參與程度中可見一斑。但是，針對不同的防疫措施，民眾的遵從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對於同一措施，不同群體的遵從程度也會不同。唐國傑團隊通過比較在澳門收集的三次防疫調查數據，對上述問題作出探討，以求為進一步應對疫情建言獻策。首先，他們的研究發現，在所有措施中，澳門居民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這一項上做得最好；但是，隨着時間推移，居民對這一措施的遵從程度也有所下降；在所有居民中，35—45 歲男性群體在這一點上遵從度最低。其次，研究發現，對於在公眾地方保持 1 米社交距離這一措施，絕大多數居民都做不到，儘管這一行為隨着疫情的發展有所改善；在所有居民中，年輕人最難做到保持社交距離。再次，對於兩類不當的抗疫行為如“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和“非必要的外出”這兩項上，超過六成的居民做不到。針對以上的發現，研究倡議政府和民眾都要意識到澳門防疫的成功之處和可能的薄弱環節，繼續努力，力爭繼續保持抗疫優等生的地位。

作為支柱產業的博彩業吸納了超過 8 萬的就業人口。疫情以來，各大博彩企業積極履行其社會責任，力爭做到不辭退員工。面對經濟的大蕭條，企業員工即使保住了工作職位，也不得不面對減薪或放長假等措施，進而面臨各種各樣的焦慮。本期的第三篇文章《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一文正探討了這一課題。通過對疫情期間澳門綜合度假村 300 多名員工以及 70 多名管理者的問卷調查，劉丁己及其團隊重點研究了企業領導的責任心對員工焦慮的影響。研究發現，受新冠疫情

影響，員工的忙碌心態會增加他們的焦慮程度，進而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與此同時，企業領導人的責任意識則能顯著地緩解員工焦慮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建議企業領導人在疫情之下，要更加強化責任意識，積極和員工溝通，從而把疫情對員工的影響降到最低。

疫情以來，特區政府積極開展各種措施，保障居民就業。雖然疫情對經濟就業造成重大衝擊，澳門的失業率也有所上升；但是，在特區政府的積極干預下，失業率仍維持在較低水平。2021年中（7—9月），澳門的就業總人口為37.56萬人，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為68.5%，總體失業率為2.9%。本期的第四篇文章《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由鄧益奮撰寫。文章首先回顧了疫情對澳門的嚴峻挑戰，如本地生產總值的斷崖式下降、博彩收入顯著下跌、入境旅客銳減、失業率上升、月收入中位數減少、酒店入住率下降等。其次，文章亦回顧了澳門特區政府應對疫情的總體政策，包括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推出三輪經濟援助、推出本地遊等。再次，文章介紹了澳門“保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如帶津培訓計劃、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以及扶持青年就業三方面。最後，文章為新冠疫情下澳門就業政策的完善方向提供了幾點建議，包括堅持積極就業政策、完善職業培訓、堅持民生導向、落實本地人優先就業，以及積極支持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

作為全球最大的賭城，博彩業給澳門貢獻了一半的本地生產總值以及近九成的政府稅收。疫情對博彩企業的衝擊首當其衝。在本期的第五篇文章《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一文中，曾忠祿詳細研究了疫情對博彩業的具體影響。文章發現，總體而言，2020年澳門博彩企業的收入下降了近八成，六大博企全面虧損，其中金沙虧損最嚴重，高達127億港元。2021年前七個月，博企收入有所改善，但仍損失了67%的收入。文章進而認為，博彩企業受損的不僅僅限於財務，還包括信用、應收賬款以及資產估值等影響。與此同時，與全球其他地方的博彩企業相比，澳門博企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如捐款、捐贈抗疫物資、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援、為零售租戶減免租金、不大規模裁減員工、提供隔離酒店等。文章最後指出，儘管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博彩企業對澳門的長遠發展仍充滿信心。

儘管疫情對全人類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不同群體和行業受影響的程度卻有所差異。一些行業因為疫情帶來的改變而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高等教育則是其中之一。在疫情之前，線上授課、線上會議還是一種非主流的教學手段。疫情催生了線上教育的蓬勃發展，線上會議幾乎成為常態，並且還體現出傳統線下會議所不具備的優勢，如打破空間限制等。疫情既改變了教學模式，又改變了學生體驗。本期的第六和第七篇文章分別從這兩方面作出探討。徐威和麥雁鈴的文章《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通過對澳門高校30位從事英語教育的教師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探討疫情對大學英語線上教學的具體影響。研究發現，一方面，多數教師在網課初期都面臨着相當大的挑戰，因為疫情之前多數教師並無網課經驗。另一方面，雖然網課有克服時空限制的優點，但課堂中師生互動卻受到相當的限制，從而使得教學效果大打折扣。邵艷菊的《網課的“另類體驗”——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則從學生的角度來分析線上教育的體驗。作者對澳門某私立

大學的 26 位學生進行訪談，詳細列出了學生對網課的矛盾體驗。一方面，網課打破了時空限制，節省了學生交通成本，提升了靈活性；另一方面，時空的打破又模糊了學習和生活的邊界，讓學習變得難以集中精神。文章進而分析了不同的學生群體如本澳學生和內地生在克服網課帶來的困難以及利用網課帶來的優勢上的差異。文章最後也對後疫情時代網課的發展和前景作出展望和反思。

三、總結

疫情對澳門社會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本期的七篇文章雖然力圖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探究，但其所能涵蓋的範圍仍相當有限。我們期待着更多的學者對這一課題繼續進行深入的研究。此外，我們也期待着研究者有更開闊的理論和國際視野。正如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在本期（《澳門研究》100 期）寄語中所言，澳門研究既要有紮實的本土經驗知識，又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兩者缺一不可。沒有對澳門社會深切的關懷，研究常流於冰冷的數字而不得澳門社會的要害；沒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對澳門社會的理解則可能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缺乏更大的世界觀和格局。最後，我們期待着更多的優秀學者以飽滿的熱情、科學的方法、嚴謹的態度、開放的視野投入到澳門研究當中。只有高質量的研究和有效的知識，才能既為國際學術的發展提供獨特澳門視角，又能為澳門社會的發展貢獻良策。